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耿 青 李国庆

我的

北京花园

(英国)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 著

李国庆 陆瑾 译

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我的北京花园

(英国)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 著

李国庆 陆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北京花园/(英)立德夫人著;李国庆,陆瑾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6

ISBN 7-5013-2437-9

I.我… II.(1)立…(2)李…(3)陆… III.游记—中国 IV.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033 号

书名 我的北京花园

著者 (英)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 著

李国庆 陆 瑾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9.25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3 千字

书号 ISBN 7-5013-2437-9/K·825

定价 25.00 元

序

外国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海外汉学，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便是“游记汉学”，亦可称之为“记实汉学”（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考古报告）；其后发展为“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东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国人也不断来华，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不过，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入贡和从事贸易等，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

外国人的来华游记，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

外，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如柏朗嘉宾 (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报告。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间谍”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继此之后，又有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 1215–1270年)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Ordon de Pordenone, 1286–1331年)于1318–1328年出使中国，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出使中国，孟德高维诺(Jean de Mont-Corvin, 1247–1328年)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响者，非马可·波罗及其传世名著《寰宇记》(1298年)莫属。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死后发现了美洲。”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为寻找“契丹”和“日本国”，才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

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年)。他自1582年入华，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他留下的那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1615年）。在这个时代，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有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商人等，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他们所属的地区，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此时来华的外国人，除了为“朝贡”贸易之外，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中国依然为“天朝上国”，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

到了清朝后期，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来华人员更多，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一类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任人出入。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

面。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最新奇的是，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已经大相径建，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或者就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出使报告、信件、游记、考察记、考古报告。他们的这些著作，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如宫廷斗争等）。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在清代，这些来华的外国人，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

素之外，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仰的心情，不远万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明者。心怀恶意者，确有其人；疑惑不解者，不乏其例；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

这些外国来华人士，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许多人来华之前，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任何历史资料，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观点、愿望的遗痕与色彩，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更何况那些洋人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20多年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他们

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过分担心。

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口述史学之类“活史学”的潮流，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种类繁杂、语种颇多、数量庞大，特别是难以觅寻。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但毕竟是沧海一粟，实难满足广大读者、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推出了一套《亲历中国》翻译丛书。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

《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

补不足之处。

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

在《亲历中国》丛书出版之际，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草书本序言，以表心意。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促进本国学术发展，能有裨益，做出贡献。

耿昇

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

译者前言

好奇心，或曰求知欲，乃人类之天性。在其驱动之下，古今中外产生过无数著名的旅行家。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饱览奇风异俗、亲历历史的经验更令人羡慕。毕竟并非人人都有条件或机缘成为这种旅行家的。因此，尽管有“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他们留下的记行文字还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求知欲的宝贵资料。

在这一意义上，虽然本书讲述的是中国的人物事件和风俗习惯，原先的读者对象也是外国人，却因那人物事件是百年前的人物事件，那风俗习惯是百年前的风俗习惯，对于不能亲历历史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它还是值得一读的。

本书作者立德夫人当初并无成为旅行家的计划。她的本名叫阿丽霞·海伦·乃娃·毕维克^①，原籍是英格兰的莱斯特郡，1845年出生在马德里，20岁后移民伦敦，从事写作和女权运动近20年。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她在此期间至少创作了八部小说。尽管这些小说大多属言情一类，成就和影响

^①Alicia Helen Neva Bewicke。

也都不大，但因此而获得的文学修养对她日后的著作风行一时显然有极大的帮助。

她成为大旅行家的条件或机缘发生在 1886 年 11 月。在中国经商有成的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先生在伦敦与她成婚，第二年年初带她到了中国。从此直到 1907 年护送病重的夫婿回英国，她在中国生活了 20 年，足迹几乎遍布神州大地。在这个陌生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沉寂了几年之后，她以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之名重操旧业，先后出版了 10 本著作^①。它们皆以中国为背景或跟中国有关系，其中尤以 4 本游记最受欢迎。所以伦敦《泰晤士报》于 1926 年 8 月 6 日刊登的讣告称她是“著名的中国专家”。她的作品至今仍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她本人也成为博士论文和专著的研究对象^②。

她这方面的成就在过去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中国人记得她的是其在百年前为解放中国妇女之脚所做的贡献。《华声报》电子版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选出了 100 位在 20 世纪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的外国人士，她名列其一。她这方面的活动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该书已有中译，此不赘述。海外近年的学术专著《中国和西方：信念和活动家》^③中有一章“中国的观音菩萨第二：立德夫人和她的天足会”，也给了她的活动以充分的肯定。

①详见本书所附的《立德夫人著作一览》。

②最近的例子是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g 所著的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1907*，由 Ohio University Press 于 1999 年出版。

③*China and the West, Ideas and Activis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给予她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女权活动家的条件和机缘的立德先生名声不如太太。他 1838 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之家，在圣保罗学校受了初级教育，14 岁去柏林继续深造，因而精通德语。1859 年来中国也是为一家德国公司工作。当时他弟弟威廉，中国记录中多称立德尔先生，已先于他在中国上海经商了。1860 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立德先生丢了茶叶鉴定师的工作，却得到了周游中国南方各省的机会。有资料称他去拜见过忠王李秀成，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对天王洪秀全并无好感。事实是他参加了抵抗太平军、保卫上海的战斗，加入过华尔的洋枪队。清廷为表彰其镇压之功赏了他一个从三品的游击官衔，新中国当然就将他划入了阶级敌人之列。不过他事过之后还是回到上海跟弟弟一起经商，并颇为成功。就在此时他娶了立德夫人。在给予立德夫人条件和机缘的同时，他的生也因此大为改观。在作家太太的影响之下，他经商之余也编译了一些中国故事，写下了数本记录亲身经历的游记。所以英国的《大不列颠名人录》后来也推崇他说“很少有人像立德一样热爱中国”，“他的许多著作是了解中国的标准书”。

和太太一样，作为作家的立德先生不久之前也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中国近现代史上记下的是他的另一件被人褒贬不一的壮举：于 1898 年首次驾轮船通过三峡，开辟了长江从宜昌到重庆的航路。褒的说这对开发中国大西南意义深远；贬的说他充当了侵略中国西南部的急先锋、劫夺四川资源的野心家。事实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当

局的荣誉和奖赏，也没有获得多少实际的经济利益。历史一向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中译本《扁舟过三峡》。那既是他探索航路的艰辛记录，又是文笔生动的三峡游记。

除了短暂回英国访问之外，立德先生在中国生活了近 50 年，长期的奔波劳顿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907 年他抱病由夫人陪伴回到伦敦，次年 11 月 5 日便去世了。立德夫人从此直至 1926 年逝世，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本书译自 1905 年伦敦版。书中插图、照片尽量保留。翻译分工是这样的：陆瑾译了引言、第一至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我译了第十二章和第十四至第二十二章，最后由我校订统稿。所以如果有错，责任在我。

陆瑾对本书内容作过一个简洁而中肯的介绍，现照录如下：

本书描述的是 1900 年至 1902 年间，作者在北京短暂居住并在周边旅行时的见闻与感想。其时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强占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地；慈禧挟光绪仓惶西逃，复又还都；义和团遭镇压，退出京津；神州动乱，疮痍满目。作者除了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京及周围地区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以外，更详尽地记录了这种历史背景下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和历史事件，如慈禧回京等。字里行间又时时流露出对中国古老文化遭到战乱洗劫的痛惜，对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反思，

以及对中华民族在未来崛起的信心。全书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教育、民俗、文化和晚清官僚体制等许多方面，除了有很强的可读性外，对于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等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译事固难，而译外人所写的中国历史更难。书中有许多人名、地名和事件由于拼写与今不同，颇费思量，我们尽可能地查核复原；有些不确定或作者误记者，我们都加注说明；专名第一次出现，皆附原文，以备查考。在做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目前读书界对立德夫妇其人其作的认识有一些因翻译而产生的混乱。小者如称立德为立德乐，称立德夫人为阿绮波德·立德的。按约定俗成的规矩，立德在上海、宜昌和重庆都开办过立德洋行，立德之名应当比较确定；而立德夫人之名是取自丈夫，故也以随丈夫称阿奇博尔德为善。又立德夫人 1902 年创立的“天足会”，似乎只是在上海的一支。中国反缠足运动的起始年代也早于 1902 年^①。有文章说“她常带着她的小狗和英国小马，游历了北京、天津、烟台、上海、宁波和芜湖”。我们猜想这是误读了她的—张跟小狗和小马的合影。照片中的马应该是她在本书中多次称赞过的川马。她转述李鸿章的—句话曾被多次引用，原文是这样的：“If you unbind the women's feet, you will make them so strong, and the men so strong too, that they will overturn the dynasty.”

^①有考证说中国天足会最早成立于 1895 年。

一种译文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另一种译文大约感到此话费解，在“男人已经很强大了”跟“他们会推翻朝廷的”之间加了一句“女人再强壮起来”。我们认为，这句话应为：“你放开了女人的脚，就会使她们强壮起来，还会使男人也强壮起来，最终会使他们强大到能推翻朝廷的。”这句话出于李鸿章之口确实很值得玩味。但男人当时已很强大显然既不是事实也不是李的原意，至少不是立德夫人理解的原意。她说过的另一句话：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抚养的儿子会跟他们的母亲一样。可以为此作注。所以说，尽管翻译大多是出于增进中外互相了解的善意，但要使译文既能达意又能传神，实在很不易。出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译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教。

李国庆

2003年10月8日

目

录

- 1 / 引言 周年回顾
24 / 第一章 我家花园
39 / 第二章 两宫回銮
48 / 第三章 官员等级
58 / 第四章 皇族葬礼
66 / 第五章 京叭金角
74 / 第六章 西山诸景
88 / 第七章 花园周围
98 / 第八章 海滨胜地
111 / 第九章 温泉明陵
123 / 第十章 口外草原
151 / 第十一章 皇家园林
162 / 第十二章 西陵揽胜
168 / 第十三章 藏庙孔庙
185 / 第十四章 钟楼鼓楼
192 / 第十五章 佛道寺观
201 / 第十六章 除旧布新